

《八佰》中战争影像的艺术自觉与英雄群像的精神朝向

■文/邓正燕

二、反英雄群像与英雄价值的重构

《八佰》留给观众最为深刻的观感或许是塑造人物形象野心,较之常规的以一两个人物为线索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近年来战争影片都渐渐以多线推进的模式营造俯瞰全局的广阔视角。《八佰》在140分钟内交替穿插了众多战争参与者、旁观者的见闻。

管虎的叙事策略首先表明了战争的暧昧和荒诞。在《八佰》中,抗日战争的局势是处在政治博弈的内容中进行平行比较,更能把握这种特殊的样态。四行仓库本身并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持续四个昼夜的四行仓库之战的意义也仅仅是在行将到来的九国公约会议上向世界宣告中国并未完全放弃抵抗,在上海市内仍有中国军队在顽强作战,并以此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而隔岸观火的上海民众、作壁上观的外国记者以及悬停在仓库上空的美国飞艇,这些“看客”的存在都令枪林弹雨中的牺牲蒙上一层荒诞的幕布,仿佛这仅仅是一场戏。在战争的第一天,四行仓库就经历了毒气弹的袭击,而在外国修筑防御工事的战士也被日军俘获虐杀;电影的叙事视角紧接着又随之切换,在仅有一河之隔的对岸,方先生和外国人侃侃而谈,人们在用战争的胜负下赌注,开出了日军的赔率……《八佰》前半部分的群像刻画通过剪辑来进行深层表达,其意图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赞美英雄精神,而是质疑战争的本质,质疑战士们的牺牲是否有意义——而这一问题在后半部分得到了具有针对性的回答。

《八佰》的片头就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老鼠特写,这或许已经预示了这不是一部常规的主旋律电影。尤其在电影的前半部分,与其说是表现英雄人物如谢晋元团长临危不惧地指挥战役,更不如说是一系列人物的成长记录。端午、小湖北、老算盘和老铁这些人物的出现弥补了国产战争电影的人物缺失,他们或许可以被归之为是具有反英雄特征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反英雄人物并不是非英雄,其并非英雄的反面,而是英雄—平民这个二元对立体系的反面,旨在从根本上解构这种对立。

从起源上来看,反英雄人物的出现和世俗价值与大众文化的振兴分不开关系。往日在英雄人物的弧光下,人物不被允许保留任何缺点。然而,近年来的艺术作品开始关注战争对普罗大众的毁灭性影响,并较为真诚地表现普通人对战争的反应。战争中的人物成长这一区域仍然是战争电影的空白,导演管虎或许正有意做此尝试。《八佰》有明显的叙事层次,镜头通过前后的陈列对比将所有人都放置在一个成长的光谱中。从苏州河北岸到南岸,从战士到逃兵,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丰富的可能性。镜头为普通人的战场反应留有伏笔,端午、小湖北等角色的成长和南岸市民的觉醒本应成为电影最大的亮点,但是这一设计却未能实现。

三、空间叙事:家国精神的具像化

《八佰》通过人物、情节的编织完成深层表达,整部电影渗透着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在电影的人物群像中,不乏胆小懦弱的逃兵,而这些逃兵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我还没有成家”;与之相对得到是,所有实现了精神转变的逃兵也都是醒悟了国将不国,何以家为的觉醒者。家与国这两个政治文化概念成为电影中的隐形意义符码。

《八佰》除了出色的视听效果外,历史的话语重构和精神价值的建构也框定着电影的厚度。电影舍弃了单一的主人公表达,以表现战争全貌,但作为叙述视角的人物群像之间缺乏关联,成为流于浅表的意识形态符码。在对于精神维度的考量中,管虎导演以苏州河两岸空间的转移巧妙地将四大战役背后的民族情怀、人性百态具像化。

一、陌生化的视听语言与艺术隐喻

无论是从概念认知还是拍摄实践上来看,战争电影和宏大叙事总是有着天然的契合性。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一种极端形态,战争无疑能够凸显出丰富复杂的精神命题,从而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的天平自然而然地向后者倾斜。但《八佰》这部电影却对艺术呈现效果颇具考量,视听效果达到了一流水准。《八佰》对战争细节的表达值得肯定,而电影技术的进步也使陌生化的剪辑叙事成为可能。

在电影前半部分的叙事设计中,导演管虎不落窠臼,大胆地舍弃了单一的叙事视点以突出表现以往战争题材影片遗落的边角:胆怯的文官老算盘、不会打仗的农民一家还有身处苏州河对岸的上海市民与外国记者。而这些人所观察的战争场面也和我们通常的认知南辕北辙。管虎导演通过这样的设计将战争从两线对战的事件扩展到了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战争从而拥有了内外的双重实景。在首先爆发的毒气战中,电影镜头和剪辑都回避直接表现正规军人的反应,而是由端午通过防毒面具观察着军人死前的挣扎,由方先生在日军阵营里的见闻侧面证明日军的凶残;而到了日军下令三小时内攻下四行仓库的战役中,则与之相对地采用了真实的实地拍摄,表现战争中的枪林弹雨,从团长运筹帷幄、各连连长身先士卒到战士执行命令、奋勇作战,达到了多维度、多层次叙事的效果。这两场战役在电影的前一小时内间隔20多分钟发生,前后的对比自然格外强烈,管虎以高度的艺术自觉将一个历史事件转化为艺术对象,但在其创作中,观众反而能够较之以往更加准确地接近战争本身。

除此之外,电影中还有很多看似无用实则画龙点睛的闲笔,四行仓库中的白马就是其中最好的一例。白马在电影中的出现既合乎情理又有些突兀。在四行仓库的第一夜,人心惶惶中老算盘发现了白马,马儿受惊四处逃奔。整部电影为了突出末世感整体为黄绿色调,而白马在这样的景象中奔跑跳跃,视觉效果格外突出;但也正是在这种对比下,其作用才更为重要。马作为战争装备而出现在四行仓库中似乎是理所应当;但白马的出现又被光影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味;四周的昏暗与马身上的光线形成鲜明对比,令马的形象显得圣洁纯净,完全独立于战争的环境之外。

在更加深入的层面上,白马象征着光明、美好和安宁。这些在战乱年代中最为稀缺的东西只有孩童的心才能够捕捉,七月初七地驯服了白马,而七月的死又成了小湖北觉醒的契机,光明的力量就像火炬一般在少年的身上传递,而也正是这一代人将要取得最终的胜利。白马的象征意义在电影最后又扩散开来成为和平的符号,困座谢晋元骑着白马和日军将领谈判,四行仓库的战役画上句号。白马由此串联起电影中一条重要的线索,为抗日战争的整体局势留下伏笔。

电影用空间形象对家—国这组符码进行了艺术的表达,《八佰》在叙事方式上的特殊性体现在其并不仅仅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也在空间的分布和转移中表征自身。《八佰》的空间布局很鲜明地分为苏州河两岸,这个空间的分区并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重现,更还是导演管虎对电影题旨的隐喻。《八佰》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人公,但却有着一个核心的叙事动力,即表现一场从分隔(孤立)到整一(团结)的群体运动。

电影在河的地理符号与文化符号的双重意义上实现了整合的符合。在电影刚开始,河的存在意义在于分隔。当四行仓库炮火纷飞时,不足百米外的苏州河南岸由于受到租界保护,上海市民和外国记者都在此安全地饮食起居。正因为阻隔和无法触及,南岸反而更具诱惑性,南岸成为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这段河的距离催化着四行仓库内军心理的变化,失败主义的情绪广泛存在,端午、老算盘等人也纷纷计划并实行凫水逃跑。在端午的观看中,歌女的形象与河是重叠的,二者都是永远无法触摸到的虚幻的目标。从分隔到消除分隔的荒诞尝试中,电影前半段的河和两岸都发生了更为暧昧含混的变化,由具体的地理位置逐渐抽象,成为文化的隐喻。

而随着情节的推进,到了电影的后半部分,河又复位为单纯的苏州河,八佰战士们需要过桥从北岸撤退到南岸。在这种条件下,暧昧的界限就又变得十分清晰,因为两岸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在北岸,战士们渐渐被迫于无奈、各自为战的状态而逐渐团结一致,将自己认同为四百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冲桥前,士兵们都掘好自己的墓穴,做好了和整体共存亡的准备。而在南岸,民众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北岸还是南岸,情节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达到了“和合”的境界,人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生死之中,这也就对以老算盘为首的人物进行了价值的否定。二者的对比突出了根植在儒家思想中的道统。

导演管虎似乎试图通过这样的空间叙事揭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转机出现在全国上下团结统一之时。发生在四行仓库中的战役是表面上的刀光剑影,而在南岸市民心态的转变则是发生在光下,人物不被允许保留任何缺点。然而,近年来的艺术作品开始关注战争对普罗大众的毁灭性影响,并较为真诚地表现普通人对战争的反应。战争中的

电影中出现的各种方言在这个整体语境中也显得意味深长。从河南、湖北到上海,各种方言的作用在于强调了语言能指的在场。尤其是在年轻战士用人肉炸弹的方式跳下四行仓库阻挡日军敢死队的一幕中,每位战士死前都用方言表明自己的籍贯和身份,并且吼出了自己的遗言。语言成为建构认同感的有力工具,它首先将独特的身份赋予了每个士兵;其次,此处的语言又都被用作为如此悲怆的同一目的,所以当每个战士跳下仓库的时候,他们的语言外壳随着英勇的牺牲行为而消失了,但却在无形之中建立起认同的桥梁。

(邓正燕,四川传媒学院讲师)

流行音乐在当代中国青年电影中的作用

■文/梅佳琪

叙事也在牵引时间线的推移,传达着时代记忆。可以说,一首歌曲往往比图像更加敏感快速地唤起人们的记忆,人们能够在歌曲的旋律当中感受到岁月的变迁。在这些青春电影中,导演们通过对音乐的运用奠定了影片的背景时期和怀旧的氛围,唤起了观众的时代记忆。

二、表达人物心理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音乐与画面的功能无法割裂。音乐相比于画面而言更为抽象,它无法像画面一样具体对客观世界进行表现,然而它却具有极强的概括能力和表现力。在一部文学作品当中,它能够通过直白或侧面地刻画人物心理;而一部电影在对人物心理进行表达之时,除了运用独白或旁白的“画外音”形式将人物心理外化之外,音乐的运用不失为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用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而突出人物形象。音乐表达的张力是无穷的,它能够使观众在观影之时将自己的情感体验与电影中人物所处的境遇进行代入联想,从而心生触动。

在影片《芳华》当中,经历了一系列挫折打击的何小萍在经受战争刺激之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众人在组织的领导下观看文工团的表演,小萍就是其中一员。舞台上曾经的战友在表演着《沂蒙颂》,此时原本眼神空洞的小萍出现了微妙地情绪转变,她缓缓站起,推开了门走出了会场,在月光下伴随着《沂蒙颂》开始翩翩起舞。导演采用了一个全景来表现这一幕,这个场景又何尝不代表着小萍的种种心境。一个精神病人旁若无人地舞蹈表现了她的境遇,强烈体现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她是一个不被接受的人更是不被理解的一个人,没有任何言语的解释却更加触动观众的心理,音乐的表现力可谓一览无遗。影片中还有这样一个片段,萧穗子一行人在房间里尝试当时新式洋气的服装,这时战友拿出了一个新歌录音机,录音机里传出了邓丽君的《浓情万缕》,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被禁止的,邓丽君的歌曲被定义为“靡靡之音”。可文工团里的男兵女兵都是芳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不禁被这样新颖的旋律所吸引。这暗示着一种“禁忌的打破”,表面上的行为打破更是人物内心的一种映射,刘军不禁感慨“句句往心里钻啊!”这也为之后刘军鲁莽地向林丁丁表白做了铺垫,表现出了他内心已萌生出的情愫以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导演陈可辛在《中国合伙人》也运用了很多音乐来表现人物的情感世界。《Leaving On a Jet Plane》这首歌曲出现在两对情侣的分别之际,这首歌的旋律首先就奠定了一种伤感的氛围。在模拟签证场景之时,成东青问苏梅:“你还会回到你的祖国吗?”苏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告诉成东青自己已经通过了签证。此时音乐响起,歌者唱着“All my bags are packed, I'm ready to go, I'm standing here outside your door, I hate to wake you up to say goodbye……”两人不语沉默,而歌词已经表达出了苏梅的内心。宿舍里,成东青在一旁沉默地看着同样被女友抛下的王阳在焚烧着手稿。一人沉默不语,一人魔怔笑骂,这种声画对立的方式给观众造成强大的心理冲击。同样在《中国合伙人》这部影片中,催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出现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歌词的内容与成东青艰辛起伏地求学之路甚为贴合。歌曲伴随成东青初到燕京大学出现,镜头在学校里不断切换,这一切对于成东青而言都是新鲜的,歌词反应了人物内心对一切的好奇与紧张以及对未来的向往,也为其戏剧般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电影《观音山》讲述了大都市中生活在边缘的三个年轻人的故事,影片前半部分出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无疑是三个人内心的写照,三个人在城市中的生活就好像一场游戏一场梦,明天和意外谁先来,没人知道;未来在何方,

纵观近年国内电影市场,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到《匆匆那年》、《中国合伙人》、《左耳》,再至《无问西东》、《芳华》等,这些青春电影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由此观之,青春电影无疑是在我国影坛掀起了一股怀旧浪潮,让70、80甚至90后集体陷入了“追忆往昔”的情绪当中。而当下社会高速发展,回顾自己过往的青葱岁月不失为人们释放心理压力的一种方式,它能让人暂且忘却现实,在回忆的乌托邦中找到心灵的慰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些以怀旧、青涩情感、梦想为基调的青春电影恰好契合了我们每个人潜意识中的怀旧情怀,从而引发观众的共鸣。

1927年,美国华纳公司拍摄的《爵士歌王》问世,至此电影告别默片走入有声时代。音乐作为电影声音中不可或缺的一页,它的作用不言而喻。而青春电影的热映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它抓住了受众的情感体验,它的成功更是无法忽略音乐的所起到的情感催化作用。我国著名作曲家王云阶认为:“电影音乐中的音乐主题的构成和发展,和声的明暗浓淡和进行的目的性、复调音乐手法的适当出现、乐器的色彩与特征的发挥,以及曲式的运用、高潮的布置和整个音乐的结构等,都得服从电影艺术的整体要求,只能再这个前提下发挥作曲者的独创性和风格。由此可见,我们要评价一部电影的音乐成功与否,主要看它是否很好地表达了影片的内容、深化了影片的主题。于此,本文将从音乐在唤起时代记忆、表达人物心理以及深化影片主题三个方面来探析其在中国青春片当中起到的作用。

一、唤起时代记忆

历史上每个时期的文化形式都是特定的时代产物,如果说世界上有时光机器,那么“音乐”作为一种载体首当其冲。每一个年代都有那个时期的专属记忆,而每个年代都有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这些承载了青春过往的音乐就成为了连接当下与过去的载体。诚如香港导演王家卫所说:“音乐,不仅只是气氛营造的需要,也可以是让人想起某个年代。”

由于乐曲的音调、曲式以及演唱方式的不同,每个时期都会有特定的音乐风格,所以当某个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感受到特定时代的召唤,一支能够突出时代印记的音乐远胜于人物造型与布景方面的强拗。所以,导演在进行影片创作之时,选取能够代表影片时代背景的音乐,可以使得观众快速找到自身代入感以期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陈可辛导演的《中国合伙人》是一部典型的怀旧青春励志片,影片讲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三个大学生共同打拼事业的故事。导演陈可辛在影片中融入了大量带有时代记忆的歌曲,其主题曲及所有的插曲都是选取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音乐,真实地表达了当时主角所处的社会和人们的文化生活,这一举措无疑使得影片更具表现与张力。这部影片所叙述的故事有将近30年的跨度,陈可辛采用了线性结构叙事,而对音乐的巧妙运用无疑消解了这种叙事手法的零散之感,使得画面与音乐融为一体,便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的发展。片中,无论是《国际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是《光阴的故事》,每当前奏响起之时,都把观众带入了特定的时代回忆当中。

在冯小刚导演的《芳华》中,音乐所代表的时期特定性更加显著。原片伊始,文工团排练的舞蹈《草原女民兵》就是一部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此时文艺女兵的曼妙舞姿加上另一端乐手们演奏着乐器,这种西方管弦乐加上中国传统民乐的搭配,是70年代的特产物,也是导演巧妙地为整部影片配乐定下的时代基调。而在文工团日常的生活巾,《洗衣歌》、《绣金匾》等歌曲都鲜明地体现出特定的时代印记。当大家含泪举杯,“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陀螺)一曲响起,就预示着文工团已到了解散之际。音乐在《芳华》这部影片中的隐性

也无从知晓,只有当下不断努力才能生存下去。片中另一个场景,南风、丁波、肥皂三人偷偷地将房东常月琴过世儿子的事故车开走,三人驾车疾驰在路上悠然自得,他们暂时忘却了生活的彷徨。此时收音机里响起了许巍的《蓝莲花》,歌词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唱出了三个人对自由、对明天的向往,人物的内心被一览无遗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音乐所表达的内容不是直接而具体的,它在激起人的情感和情绪方面是最准确且细腻的。相比于画面,音乐具有“表意而不绘形”的优势,所以音乐往往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从而弥补画面无法刻画的人物感受以及复杂的心理体验的不足之处。

三、深化影片主题

每一部电影都有导演要诉说主题,那么电影中所有的元素都应为突出影片的主题而服务。为达到深化影片主题的作用,主题音乐无疑是导演最常采用的方式,它包括电影的片头或片尾曲。主题音乐不仅能够将影片主题进行渲染,同时有利于电影的前期宣传,从而达到电影的艺术与商业的双重效果。

电影的主题曲是导演对影片情感的集中爆发,旨在使观众听到主题曲时能够与导演产生相同的情感共鸣。王菲演唱的《匆匆那年》,作为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在影片中充当着一条叙事线索的作用,是陈寻写给方茴的一首歌,由于阴差阳错方茴始终没有听到。在影片后半段,陈寻含着泪水在起牌的婚礼上演唱了这首歌,导演张一白如此设置升华了电影的主题,暗示了五人之间友情的匆匆以及时光的流逝,引起观众的共鸣。在2017年上映的《无问西东》当中,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在呼应主题的同时,更是将“青春”一词拔高到了天地辽阔的大格局当中,颇具哲思意味。而由毛不易演唱的片尾曲《无问》则从细腻的情感体验入手,将观众带入感性的漩涡。

电影的音乐除了主题曲之外,同样还有插曲。在上文笔者谈及的《中国合伙人》当中,《光阴的故事》、《外面的世界》以及《一样的月光》三首歌曲在使观众追忆似水流年的同时也深化了电影的主题。主人公们在历经沉浮和迷惘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创业目标,也引起了观众对于人生的反思。《一样的月光》有这样一句歌词“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而影片无疑一直在鼓励观众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改变自己还是改变世界”。最后,旁白说“成东青没想过改变世界,并坚持不被世界改变”,此时《光阴的故事》一曲适时响起,这无疑使对《中国合伙人》这部影片进行了总结,逐步将影片的主题深化并推向结局高潮。

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So Young》一曲作为插曲贯穿全片,而这部影片的英文片名就是“So Young”。歌曲中所表达出的冲动、彷徨与影片青春不羁的主题相互照应,彼此起着促进的作用。在影片的后半段,阮莞不幸车祸去世,她用冲动和无畏将自己的青春定格在那一瞬间,这首《So Young》渲染了这种奋不顾身的情怀,令人回味。所以,电影音乐对影片主题的深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对观众以情绪上的引导,发人深思。

电影是一门视听艺术,我们常因为一首音乐唤起某些尘封的记忆,音乐有时比画面更容易让人铭记。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音乐的抽象性给观众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想象。它不断切换,这一切对于成东青而言都是新鲜的,歌词反应了人物内心对一切的好奇与紧张以及对未来的向往,也为其戏剧般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梅佳琪,九江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